

马来西亚中文地名音读特殊变异举隅

邱克威

提要 地名字音变异往往超乎自然音变规律，这其中包含了各种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马来西亚由于多方言与多语言的接触，中文地名的音读更呈现出多重的特殊性。本文举“巴生”“万饶”“昔加末”“亚罗士打”“古来”等为例，对这五个中文地名音读与用字的历史演变进行考索与分析，试图展现地名音读特殊变异产生的各方面因素及其变异机制，由此展现出语言社会变异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过程中当然也对马来西亚中文地名的由来作了必要的考证。

关键词 马来西亚中文地名；马来西亚华语；地名音读；字音变异；地名由来

1. 绪论

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就提出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的音读很不规律。他说：

《春秋》人名字、氏族及地名，或前后互出，或经传更见，如此之类，不可具举。若国异名同，及假借之字，兼相去辽远，不容疏略，皆斟酌折衷，务使得宜。

对此“相去辽远”的人名、地名音读，陆德明指出应慎重处理，“不容疏略”。陆志韦（1946[2003]）给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读若”注音进行分析，也发现地名字音往往不合乎历史音变规律，于是他说：

地邑之名每不可以音理拘也。（1946[2003]：200）

从传世古书上专名用字的特殊音读来看，杨永龙（1999）、陈会兵（2008）等都作过细致的考察，揭示其中“保留古音”“外语译音”等现象。而陈会兵（2008：114）更就专名用字与字音的复杂性进行了诠释：

这些名称的由来大多难以确考，其用字读某音，最初可能用原字原音原义为名，也可能只借原字原音为名，还可能借原字形而改其音为名，不管哪种，一经约定，就代代相传，颇难改变。原字在历史发展中可能产生音变，而专名读音却不容易改变。

另如邱克威（2012）也曾对《说文解字》27处地名“读若”中9处声韵不和谐的注音进行综合考证并提出音变解释，从中揭示地名字音在多重方言的错综影响下，其音读变异情况确实很复杂。

马来西亚作为多语多方言的社会环境，其中文地名的音读与用字，虽然年代不深未必有“古音”的问题，但由于牵涉的多方言交叉影响与汉外译音等因素，使其地名字音在复杂的社会语言影响机制下呈现出特殊变异的现象。所以作为地名字音特殊变异的实例，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案例。而且由于年代不甚久远，对于这些地名的变异，我们仍能挖掘不少线索；这对我们重现其字音变异的轨迹，同时考察其变异的内外机制，都有极大助益。由此我们也更能体会古今地名字音变异的复杂性。

2. 马来西亚地名音读特殊变异

关于马来西亚中文地名，此前已有不少人进行过讨论。举例如许云樵（1951、1961、1973）、肃明（1961）、唐南生（1962）、戴淮清（1962）、郑文辉（1964）、潘醒农（1967）、黄尧（1967）、温梓川（1969）、方父（1972）、一而（1972）等等，甚至于近期也有不少，如杜忠全（2009）就是一例。此外许云樵早在 1961 年就曾作系统收集整理，甚至还计划编写一部《马来亚地名辞典》。（许云樵 1961：《凡例》）其编著《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所附录“叻甲屿三州府地名华语俗称”（许云樵 1961：58-138）应是目前为止地名华语特殊称谓的最全列表。

但上述文章多是属于地名溯源与由来的讨论，只有戴淮清（1962）、许云樵（1973）涉及地名字音的问题。无独有偶，二者均是考证华巫对音的。戴淮清是以“音转原理”从历史文献中的马来亚地名汉字转写去追溯其古今地名音变；许云樵则是讨论如今华巫地名对照上的问题，尤其如“吉隆坡”“芙蓉”（许云樵 1973：84-85），都揭示了华巫地名对应上的复杂现象。

马来西亚是个多语多方言的语言环境，境内通行的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和华语，而华语同时又与闽南方言、粤方言并行。虽然目前华语逐渐取代方言作为华社通行用语（Wang 2012），然而早期通行语则是方言。更重要的是，至今马来西亚华人社区仍大致保留早期移民的方言群聚居形态（麦留芳 1985），因而形成不同的社区方言；而从更大地域来看又有区域强势方言。比如临近吉隆坡的沙登（Serdang）地区本是客家村镇，但由于地处马来半岛中部粤方言强势区域，目前其社区主要用语已是粤方言，而客家话则退居为家庭用语。（黎卓蓉 2012）社会用语的交替与转移现象，往往就会不同层面地折射于本地地名字音上的变异。

所以，由于马来西亚多种语言及方言的交错影响，中文地名往往会随着华人音译以及当地通行方言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或是改变字音、或是改变字形，由此而造成一些“不可以音理拘也”的特殊现象。

我们略举五则为例，即“巴生”“万饶”“昔加末”“亚罗士打”“古来”，其中牵涉的有方音现象、方言与马来语对音特点等因素，而且都是多重因素的相互交叉影响。我们这里的分析着重于揭示其地名字音变异的特殊现象，其中若涉及地名由来等考证，则视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诠解。

2.1 “巴生”（Klang）

巴生，位于马来半岛中部雪兰莪州（Selangor），临近吉隆坡，是中马一带华人最早大量聚居的地方。

今“巴生”与其马来文名称 Klang 相差很远。对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巴生”是马来语 pasang 的音译，意为“涨潮”，因其港口得涨潮货船才可靠岸；而 Klang 之名称则因港口造船时的敲击声而来。前者为华人称谓、后者则是马来称谓。（大将出版社编 2006：8）

然而，许云樵（1973：84）曾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吉隆”其实是 Klang 的音译，后来张冠李戴为今天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这似乎有一定依据，如郑和下西洋之航海图所标示之“吉令港”，即今日之巴生港口。（转引自徐威雄主编 2012：20）

不过，质诸 19 世纪文献如《叻报》，我们会发现当时“吉隆（或作‘吉垅’‘吉壘’）”“吉隆坡”“柯勝攬保”等地名互见，称谓情况相当复杂。比如“轮船开行”时刻表（1887/8/19，1724 号）¹，停靠港口有“吉壘”与“柯勝攬保”，显是二地。其中“柯勝攬保”当是 Kuala Lumpur 的音译，如此则“吉壘”就不应是今天的吉隆坡。然而，同年有二段文字却值得我们注意：

接吉隆友人递来邮简言：刻接前途来信，谓卫制府宪节已定于西九月五号即华本月十八日行抵吉隆，故参政罗公接悉行知，即飭令稽查道路之巡捕官清尘以俟。限至西本月三十号为止，各处道路务须一体整洁，以美观瞻。至于制府此次巡隆因何公干，未见明文。或谓因彭亨之事而往，亦未可知。盖制府之意欲以彭亨拨归吉隆兼治也。（1887/8/30，1733 号，“制府巡隆”）

现本厂已迁至工部局货舱左邻近；复分枝一厂，在吉隆坡仙四师爷官后大马路至下巴双河边桥头右边开张，以便吉隆诸君选沽机器以及修理机器等事。（1887/11/9，1794 号，“活侯亚士坚公司告白”）

这里二处“吉隆”，前者无疑是专指 Kuala Lumpur；而后者所指称的地域至少也涵盖 Kuala Lumpur。因此，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吉隆”本指 Klang，后兼指 Klang 及其周边地区；1880 年后英殖民政府行政中心迁至 Kuala Lumpur，政经中心的转移也开始反映在口语中“吉隆”或者“吉隆坡”²之指称，再后乃成为专名。也就是说其地名所指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并非完全仅是张冠李戴的误植所致。比如《叻报》1918 年 11 月 20 日之 Central Engine Works Ltd 广告，英文“Singapore, Kuala Lumpur, Klang, Johor Bahru”，中译为“新加坡，吉隆坡，柔佛”。（10793 号）可见当时以“吉隆坡”通指 Kuala Lumpur 与 Klang 二地。

其实，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地名字音变异实际是指上引文中出现的“巴双”一名，及其与今“巴生”之关系。

首先，“巴双”作为马来语 pasang 一词的闽南语音译，其对音是完全准确的。其次，“巴生”名称用字出现晚于“巴双”，比如 1921 年《叻报》“巴生恒和号”（1/4，11420 号“吉隆坡谢慎和、新加坡谢怡和大扩充广告”）。19 世纪文献则作“巴双”，有时也做“巴霜”。不论是“巴双”或“巴霜”，其闽南音均为[pa saŋ]，即音译马来语 pasang，至今华人方言口语中该地名仍是[pa saŋ]；反之，“巴生”之闽南音则非[pa saŋ]。

巴生是马来半岛中部闽南人的重要聚居地，至今仍是如此，当地地名在马来西亚华人方言口语中就叫[pa saŋ]。按“生”的闽南语字音文读为[seŋ]、白读作[sē]或[sī]；“双”字读音则是[səŋ]。因此明显的这个闽南地名读音[pa saŋ]应是“巴双”。那么当地闽南人口里的[pa saŋ]，为何竟改写为字音不符的“巴生”二字。

巴生之“生”字，粤语正读作[səŋ]。因此如今地名用字“巴生”，显然是[pa saŋ]这个地名音读的粤方言转写所致。吉隆坡进入 20 世纪之后就成为粤方言族群的强势区域，目前整个马来半岛中部地区都是粤方言的势力范围。这一个“巴双”至“巴生”的地名用字改写，正体现出这样一个强势方言区域形成下的地名变化。当然，具体变化的时间及其变化的机制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材料佐证。

2.2 “万饶” (Rawang)

“万饶”，位于雪兰莪州的北面，其马来地名为 Rawang，今中译为“万饶”。从对音来看，似乎是前后音节倒置而成。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解释。但是许云樵（1973：85）曾提过“万饶”其实是 Rawang 附近某一地名的音译，因误植而转嫁到 Rawang 身上的。这是目前对这一地名对音现象的最早解释，但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其实许云樵的提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尤其当我们考虑“万饶”与 Rawang 若为前后音节倒置，则明显为华语对音，这不符合早期马来西亚中文地名的方言对音本质；且 Rawang 作为早期锡矿区，其中文译名也不可能晚至华语成为通用语以后。再退一步想，即使视为前后音节倒置，其对音也不尽准确。

如果我们考察更早的文献，正可为许云樵的主张进行佐证。比如《叻报》自 1887 年 8 月 27 日（1731 号）开始，均有大幅广告“勝汪锡矿有限公司招股告白”，其云：“本公司之开设专在勝汪等处开采锡矿为业。”因此这里的“勝汪”明显是地名。

这家“勝汪锡矿有限公司”，正是马来亚锡矿业史上著名的 Rawang Tin Mining Company Limited。这家公司的管理总部设于新加坡。（Cowan 1964[2012]：137）关于这家公司在“勝汪等处开采锡矿”的业务，1887 年 8 月 24 日《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报道说：

The Company, as the Prospectus states, has been formed “for the purpose of acquiring a mining grant for 30 years of the property at Rawang in the Territory of Selangor, selected under a concession from His Highness the Sultan of Selangor to William Paterson, Esq., dated 17th October and 20th December, 1882, ……”

[该公司，据《业务报告》称，其成立是为了“获得在雪兰莪州内勝汪地区的 30 年开采锡矿准证，且是由雪兰莪苏丹于 1882 年 10 月 17 日与 12 月 20 日颁发特许权予威廉帕特森先生，……”]

这两份日期相隔三天的中英报章相互参照，自可证明《叻报》之“勝汪”就是《海峡时报》上的 Rawang，也即今日雪兰莪州内的“万饶”。

其实另有 19 世纪文献出现过“唠横”，其旁英文标注“Rawang”。（参见徐威雄主编 2014：20）可见不论是“勝汪”“唠横”都显然是 Rawang 地名的粤/客方言音译。

因此，我们由此确定了 Rawang 中文译名本是“勝汪”“勝橫”，自可加强许云樵（1973）主张的可信度。然而对此变异形成的种种，我们仍了解得不够。林穆群（1926a）《南洋群岛商埠考》曾记载：

轰埠（Kuang）位置在雪兰莪之中部，居于万饶之南。马来联邦铁路自古毛经万饶至此而达吉隆坡。

这里的“万饶”即今之万饶（Rawang），可见早在 1920 年代该地名已称作“万饶”。这或许可为我们考察“勝汪”何时转为“万饶”提供一定线索，然而至于这种地名误植的情况何以会发生，而且何以误植地名竟能完全替代原本地名等等，我们却仍无法确知。只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才算是真正厘清“万饶”地名的由来，也才能真正明白这一地名变异的机制。

2.3 “亚罗士打”（Alor Setar）

“亚罗士打”，即马来半岛北部吉打州（Kedah）首府 Alor Setar 的中文译名。其中的“亚罗”一音，当地老一辈人口中称作[a lok]，音节末带有喉塞尾。

邱克威（2014）曾对 19 世纪马新文献中马来语之-r、-l 音节尾在方言中的对音材料进行过分析，不论从任何方言的早期文献都明显看出几乎一律以入声字对译英巫语中的-r、-l 音节尾。举《华夷通语》中的例子：

《天文类》“拖尾星”：民冬勿黎骨（bintang berekor）

《地理类》“城市”：万叻_{入声}（bandar）

《房屋类》“篱巴”：吧葛_{入声}（pagar）

《人伦类》“老君”：落_{音多下入声}（doktor）

《器用类》“锄头”：章滑（cangkul）

《器用类》“枕头”：挽达（bantal）

《器用类》“铅笔”：贫毫（pensil）

《单字类》“小”：结舌（kecil）

以上例子都能清楚看出马来语词中的-r、-l 韵尾，方言对音中全都用入声字。

Alor Setar 中的“Alor”也是以-r 为音节尾。目前虽无文献佐证，但按照方言对音的惯性，当时人们口中对音必然也同样认为音节尾的卷舌成分-r 应有以对译，并用入声字的喉塞尾去进行对音。这就形成了目前仍存留于老一辈人口中念作[a lok]的地名音读。当然，这一入声尾何时在口语中消失，又其与转写“亚罗”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这也是有待查证的。

2.4 “昔加末”（Segamat）

“昔加末”是马来半岛最南面柔佛州（Johor）北部城镇 Segamat 的中文译名，其原本译名用字为“昔加挽”，如《叻报》1926 年 8 月 7 日“厦门永商私立桃园学校鸣谢广告”。又如林穆群（1926c）：

巫罗胶什（Bukit Kasap）一名浮老加汁，又名毛罗加十，位置在柔佛邦之北部，居于昔加挽之西北。

这里以闽南语族群为主，但今名的“末”字不论以何种方言都无法与 Segamat 的末音节“mat”准确对音。至于旧名的“挽”字，似乎距离准确对音更远。

其实这里牵涉到闽南语早期对音上的一条原则。闽南语早期对译英语词时所要求的对音准确度实在远超乎今人的想象，而其遵循原则之严格度也是超凡的。上述-r、-l 音节尾的对音就是一例。这里“挽”对译“mat”音节也属一例。

1877 年刊行的《华夷通语》是以闽南语字音拼读马来语词汇的一部辞典，其中有这么一条：

《地理类》“水缓”：亚逸览檣_{下入声} [檣音挽]

这个马来语词为 air lambat。其中“檣”字对译“bat”音节；只是闽南语中其实并无[bat]音节，而“檣”字音为[bit]。因此我们就得注意这里的注释文字：其中“檣”下的小字注说明为“下入声”，并另有注文说“檣音挽”。

可见，这里的“檣”应读如“挽”之入声。“挽”字闽南语作[ban]或者[man]，如《叻报》“甘马挽”译马来地名 Kemaman（1928/6/26，13652 号，“甘马挽华侨赈济山东灾民之热心”）；按照古韵书阳入相承的原则，其入声便作[bat]，即以同样舌头部位将鼻音韵尾转为塞音韵尾。正是因为闽南语中缺乏[bat]音节，所以进行对音时便采取这样的变读原则。这一对音原则绝非孤例，另如同样《华夷通语》中：

《人伦类》“闲人”：胡耄勃礼挽（orang berehat）

这里的“挽”仍是对译入声-t 尾。

因此 Segamat 旧名“昔加挽”中的“挽”也是同样按此原则对译“mat”音节，其中的原因自然也是因为闽南语中缺乏[mat]这个字音进行对译。当然，由于后人不了解早期的对音原则，因此将旧名用字换成今日之“昔加末”。以“末”字对译“mat”音节，则是今日华语对音中的规律，因此这一换字必然也是华语通行后的结果。

2.5 “古来”（Kulai）

“古来”是柔佛州南部城镇 Kulai 的中文译名。这里的中文地名早期写作“龟来”，直到 1980 年代古来火车站的牌子仍写作“龟来火车站”。于是关于“龟来”名称的由来，就产生一段传说，如安焕然（2009）所转述：

据说早期古来附近的沼泽地带，每当雨季来临，乌龟会爬上岸边，而当时来古来开拓的多有海南人，海南人就把这个地方称为“龟来”（海南话“龟”与“古”同音）。

这一地名由来的传说流传甚广，见诸文献大体始于 1990 年代以后，如邓国先（1993）、符志民（1999），后来杨善勇（2005）也遵信其说。当然也有不信的，如上述安焕然（2009）就表示了怀疑，而张礼铭（2013）更是直说“古来”与“乌龟来”扯不上关系，其云：

这个美丽的传说确实与史实有不符之处。根据笔者向一位对历史有研究的马来学者了解，Kulai（古来），Pulai（埔来），Senai（士乃），Skudai（士古来）都是马来地方名称，柔佛港契的档案资料也证实远在 1880 年代就有 Sungei Kulai（龟来港）这个马来地方名称。

其实，最早整理古来开埠历史的梁文华（1973）文章内并未曾提及“乌龟来”一说；而且以其年代之早，他甚至曾亲访华人开埠先驱及其相关人物或其子嗣。

首先，马来半岛内陆地区，基本都先由马来人定居而定名，华人地名多为音译。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语中 Kulai 一词为虚词，极不可能用作地名。因此我们认为“古来”地名原本是 Pulai，后来才变异为 Kulai 的。Pulai 是马来半岛一种树的名称。据林穆群（1926b）《南洋群岛商埠考》记载：

埔来 (Pulai) 位置在柔佛邦之中南部新山之西北, 居于埔来河畔, 亦柔佛邦南部大市之一。有长途汽车路与各大埠通, 地距新山约三十里, 物产以农产品为多, 地多荒芜, 故木柴甚盛, 其地属柔佛邦管, 其历史与新山同。

古来距离新山 30 公里, 至今仍是农业经济为主, 显然这里的“埔来 (Pulai)”即今天的古来 (Kulai)。另如 1932 年 Winstedt 的 *A History Of Johor* 中提到柔佛州火车沿线车站名称时列举为 “Renggam, Kluang, Pulai, Segamat” (1932[2003]: 152), 按目前火车路线来断定, 这里的 “Pulai” 显然也是如今的 “古来”。

其实古来的城镇与马来甘榜仍有保留着 Pulai 名称的, 比如斯里蒲莱 (Kampung Sri Pulai) 与江加蒲莱 (Kampung Kangkar Pulai) 等; 而最关键还有古来的山称 “蒲莱山” (Gunung Pulai), 又目前的古来河 (Sungai Kulai) 其实连接着 “蒲莱河” (Sungai Pulai)。马来语中的 Pulai 是一种树的名称, 而马来民族以树为地名是非常普遍的, 如 Senai (士乃)、Melaka (马六甲)、Ipoh (怡保)、Serdang (沙登) 等等。³

既然这个地名应源自马来名称, Kulai 又显非其马来语本名, 而周围之地名与山水都仍保留着以 Pulai 为名,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 Kulai 地名其实源自 Pulai。但问题是 Pulai 如何又变为 Kulai。

这就得从闽南语与马来语的对音上去寻找线索。许云樵 (1973: 107) 曾提过闽南语对译马来语时 “k 与 p 相混”, 举例如:

kampong (村) 说作“监光”, puasa (斋期) 说作“挂沙”而与 kuasa (授权) 相混。

邱克威 (2013) 对此补充了一些例子, 并举闽南语的特殊音变作为参照, 试图解释这一不寻常对音现象形成的原因:

闽语中由于后圆唇元音的关系往往会发生舌根音与双唇音的转换, 比如“牛”读[gu]、[ŋu], 但也有转为[mu]的, 又如“遇”也是[gu]而转为[mu]。

这也许正可以为我们解答 Pulai 地名之转成 Kulai 的原因, 以及其历史变异的轨迹。当然, 后来的发展都属情理之中, 即由于变读为 Kulai 而写作“龟来”, 以“龟”对译“ku”音节也正是闽南语对音, 而其后再由“龟来”二字又产生出上述“乌龟来”的传说。

这种后世附会的名称由来传说, 是民俗研究中所惯见的。无独有偶, 距离古来不远处的“居銮” (Kluang) 地名由来传说也有同样现象。“居銮”本译自马来语 Keluang, 意为“蝙蝠”, 然而黄尧 (1967: 152) 曾记载, “一八九九年间, 有三十个琼州华人”至此, 感觉“大有安居在‘金銮殿’般的舒服”, 故称“居銮”。这与“乌龟来”传说都同属于后世附会的例子。

3. 结语

许云樵《南洋华语俚俗辞典》附录“槟榔屿市街化名俗称汇录”中提到其路名由来考索的用意, 云:

吾人若不识其名, 即问津亦属徒然, 若闻名而未究其分段, 亦难得其址。惟华名俗称, 闽粤有别, 时代先后, 不无变更, 若不录而释之, 不免数典忘祖, 姑以笔划为序, 俾得按索有方。(许云樵 1961: 109)

我们对马来西亚中文地名的考索, 重点取其音读变异之具有特殊性的。因此我们的目的并不尽在于历数祖宗的坟典, 而是更要由此揭示前人所谓“地邑之名每不可以音理拘也”的道理。比如“巴生”一名, 按闽南语字虽作“巴生”但却应读作“巴双”; 又如“昔加挽”, 若不了解早期对音原则必以“挽”字闽南语读作[mat]音; 再如“古来”一名, 如不了解其音变原理, 则势必跳不出“乌龟来”的附会讹传。

这些地名音变现象，若年代久远无从考究，则留存下来的就是一堆“不可以音理拘也”而不合规律的字音变异。因此，我们通过对上述地名及其用字变异的考证分析，试图展现地名音读变异的复杂机制，希望能对我们理解古今地名音变种所隐含的各种特殊社会语言现象有所裨益。

附注

1.《叻报》自创刊号起，每份均标上序列刊号，本文凡引《叻报》，除注明日期，也同时标示刊号，以方便检索与查证原文。下同，不另出注。

2.二者实无分别。早期南洋惯以“坡”或“埠”置于地名后表示城镇。

3.另外，马来西亚各地以Pulai为地名或路名的很多。最著名的为吉兰丹（Kelantan）的Pulai，中译为“布赖”。马来民族习惯以树名为地名，因此马来半岛相同地名重复的相当多，如Serdang也有多处，如雪兰莪州和檳城都各有一处Serdang。

参考文献

安焕然 2009 古来、龟来、海南陈学风，吉隆坡：《星洲日报》，11月15日。

陈会兵 2008 《古书中词语的特殊读音研究》，四川：巴蜀书社。

大将出版社编 2006 《巴生百年照片选集》，吉隆坡：巴生福建会馆、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戴淮清 1962 以音转原理考证古代南海地名，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3卷第8期）》，19-24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邓国先 1993 《古来今昔》，，古来：东风出版。

杜忠全 2009 《老檳城路志铭》，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方父 1972 安顺街名考，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13卷第2期）》，125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符志民 1999 《劫后余生》，古来：新海洋。

黄尧 1967 白头老客话街名，载黄尧《新马华人志》，213-216页，香港：明鉴出版社。

黎卓蓉 2012 雪兰莪沙登新村华人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学文》第2期，118-127页。

梁文华 1973 古来开埠简史，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14卷第3期）》，186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林穆群 1926a 南洋群岛商埠考（十八），新加坡：《叻报》，9月7日。

林穆群 1926b 南洋群岛商埠考（二二），新加坡：《叻报》，10月12日。

林穆群 1926c 南洋群岛商埠考（二三），新加坡：《叻报》，10月28日。

陆志韦 1946[2003] 《说文解字》读若音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陆志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麦留芳 1985 《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潘醒农 1967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新加坡：南岛出版社。

邱克威 2012 从《说文》地名“读若”探讨古代地名文化遗产的传统，马来西亚第九届国际汉学研讨会宣读论文，韩江学院。

邱克威 2013 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1-24页。

邱克威 2013 19世纪末马新方言文献中马来语音节末尾流音-r、-l的对音——兼论中古汉语入声弱化问题，《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3卷第2期，1-14页。

肃明 1961 马来亚地名杂谈，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2卷第12期）》，60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唐南生 1962 马来亚城镇命名的由来，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3卷第1期）》，45-48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温梓川 1969 檳城街路纵横谈，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10卷第8期）》，531-533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 徐威雄主编 2012 《移山图鉴——雪隆华族历史图片集（上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徐威雄主编 2014 《移山图鉴——雪隆华族历史图片集（中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许云樵 1951 马来亚独一无二的中文地名，《南洋月报》第2卷第8期，36页。
- 许云樵 1961 《南洋华语俚俗辞典》，新加坡：世界书局。
- 许云樵 1973 《文心雕虫》，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 杨善勇 2005 《从龟来到古来》，3月11日，http://hainansar.blogspot.com/2005/03/blog-post_10.html。
- 杨永龙 1999 古代国名族名等专名的读音问题，《辞书研究》第1期，111-118页。
- 一而 1972 柔佛州几个地名的由来，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13卷第4期）》，278-279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 张礼铭 2013 古来与乌龟来扯不上关系，吉隆坡：《南洋商报》，7月10日。
- 郑文辉 1964 马来亚地名溯源，载许云樵主编《南洋文摘合订本（第5卷第5期）》，39-42页，香港：南洋文摘社。
- Cowan, C.D. 1964[2012].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 Wang, Xiaomei. 2012. Mandarin Spread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Winstedt, R.O. 1932[2003]. A History of Johore.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n Illustration of the Unique Sound Changes in Malaysian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

KHOO, Kiak Uei

Abstract Geographical names underwent sound changes unique from normal change patterns, this is the result of a complicated cross-factor influence. Due to the multi-lingual and multi-dialectal environment in Malaysia, changes in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 showed a more unique form. This paper present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five such examples, namely Klang (“巴生”), Rawang (“万饶”), Segamat (“昔加末”), Alor Setar (“亚罗士打”) and Kulai (“古来”). B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sound and written form of these examples, this paper tried to explain the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se change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se changes, and exhibit the complexity of socio-linguistic influences in language variations, in due process whereby some origins of these geographical names were also explored.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 Malaysian Mandarin; Sound of geographical names; Sound change; Origin of geographical names

(邱克威马来亚大学中文系)